

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百年回响

——唐文治和“无锡国专”论略

陈国安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唐文治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经学家和理学家。作为理学家底色的教育家，他所任校长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交通大学）和无锡国专都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集工业教育先驱和国学大师于一身的唐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以《四书大义》和《十三经提纲》为代表，有独树一帜的经学成就，是晚近新“实学”的代表。《十三经读本》是他经学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无锡国专三十多年的探索是唐先生最辉煌的事业，在今天仍然有着值得深思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唐文治；无锡国专；十三经读本；经学教育；近现代教育史

作者简介：陈国安（1972—），男，江苏镇江人，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校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语文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7)01-0114-15 收稿日期：2017-01-10

DOI: 10.19563/j.cnki.sdj.k.2017.01.012

引言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太仓州镇洋县浏河镇（今属江苏苏州太仓市）人。唐先生于晚清同治四年（1865）出身于清贫的读书世家，自高祖唐景星于“嘉庆元年（1851）入州学第二名，是为吾宗入学籍之始”。到他七岁，“是时家贫约，吾母甚健，缝纫予衣补缀破裂，或结数处，同学咸姗笑之”。祖父唐学韩“读书不事著述，但颇喜抄书”^[1]。父亲唐受

祺“咸丰九年（1859）入州（太仓州）学第四名，补廪膳生，乙丑（1853）恩贡候选复设教谕”^[2]。长年在在外做私塾教师，“为学不喜标榜，不务声华”，“是一位以教书为职业的好好先生”。^[1]^[3]母亲胡氏，也“通经史大义”^[3]^[108]，且教子甚严。唐先生启蒙受业于外叔祖胡啸山，先识字，后读《孝经》。此后转学于姨父姚葆光读《诗经》《尚书》，十二岁随父赴上海，受学于外祖父胡汝直读《礼记》，从姨父钱宫极读《左传》。十四岁，《五经》读毕；十六岁，中秀才，“入州学第六名”；十八岁，金陵

唐文治、唐庆诒：《唐文治年谱》，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1984年印，世系，“辛未七岁”条，第3页。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所编《唐文治年谱》合三书而成：唐文治于七十岁时编《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35年由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学生会印行，本文简称《自订年谱》），唐先生长子唐庆诒据唐先生纪事稿本整理补充所撰《茹经先生年谱续编》，再附录据《茹经堂文集》增补的冯振所编《茹经先生著作年表》。研究唐先生一生行谊事迹当以此此为原始文献。后此所引唐先生事迹未加注释者，均出于此书。

省试，成举人，“中式第二十名”；二十一岁，入南菁书院肄业，从黄以周、王先谦游；二十八岁，“中式第三十一名贡士”，后“殿试二甲第一百五名”，座师翁同龢，房师沈曾桐。

1892年，中进士后，唐先生便开始了宦生涯。先在户部江西司任候补主事，以微职上万言书《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虽未达天听，却受一时激赏。此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后改外务部、商部、农工商部主事、章京、北档房总办、员外郎、郎中、右承、左侍郎至署理尚书，前后十二年。其间两次充使节随员，遍访日、英、法、比、美等国”^[4]。

唐先生入“尘网”十五年，1907年，二月丁艰离京，绝意仕途。九月始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开始了直到人生落幕时才告结束的教育生涯，计四十三年。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更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唐先生离任不久后即改名交通大学）任监督十四年，于多事之秋的1920年年底请辞解职回无锡。1920年12月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下简称无锡国专，虽有更名，统一简称），1921年招生开学，1950年5月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长校三十年。无锡国专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也为其一生事业最可称之于青史者。

唐先生一生事业不在户部、商部，而在南洋大学、无锡国专。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一个学校始终是这一位校长，育人数千，学生中名家辈出，教师更是一时之选，肩承中国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三十年的探索，百年以下尚有许多可思可资之处。无锡国专，褒之者认为是“最中国”的学校，贬之者认为是冬烘学究办的国学私塾；唐文治，褒之者谓为经学家理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贬之者说他是有纱帽气的保皇党复辟派。无锡国专究竟是怎么样的学校？唐文治究竟是怎样的人？

一、教育家理学家的艰难选择

人生往往没有对错，只有选择。一个人的成就有其命运的定数，而命运往往是性格使然。每个人的性格一般都是复杂的而少有纯一的，理学家讲求立身处世，随机应变而不违道之根本，所以唐文治内心的矛盾性尤其凸显。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家，而这位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又是少有（似乎是做校长中仅有）的理学家，这又为后来讨论作为学校的无

锡国专蒙上了一层不可捉摸的幻纱。幻纱后面的老校长唐先生在无锡国专“一出场”的选择就让人感到颇不可理解。

1920年，唐先生五十六岁《自订年谱》中十二月曰：“钱塘施君省之名肇曾，托友人陆君勤之介绍，属余在无锡开办国学专修馆。定开办费八千元，常经费每年一万元。余思讲学家居，平生之志，爱订定学规章程。托蔡生虎臣租借锡商山货公所楼房两幢为宿舍，地在锡山之麓。即于无锡、上海、南京三处招考，报名者近千人，取定师范生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六名。”创办无锡国专与他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辞职几乎同时。《自订年谱》于前即曰：“自上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余因吾父老病，目疾日深，已先辞工业专门学校职数次，而交通部长迄不允。至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盖函电交驰，至此凡十次矣。部中派员来留，本校同人来请留者络绎于道，均坚拒之。自问精力日衰，私衷歉仄而已。”再看《自订年谱》：“四月，组织无锡中学。初，余因无锡高等小学学生甚夥，毕业后远赴各处求学，颇觉困难，拟设立中学，怀此愿久矣。至是门人蔡生虎臣名其标，介绍门人高生践四名阳来言，奉其先人秋荃先生遗命，于锡邑设立中学。余为订定章程，具呈省县。暂租西水关马氏房屋为校址，计开办费三千元，建筑房屋费二万元，基本金四万元。践四坚请余为名誉校长。余因请江太史霁纬名衡为主任，门人周生缉庵名熙为教务长。先招初二年级生两班，四儿庆永，亦往肄业焉。”由这三则《自订年谱》中首尾相连在同一年的文字，我们似乎明显看出表述上的内心矛盾，这是十五年后追记的写定文字。

这其实是一次出处的重大选择，从公立大学辞职创办私立大学，从大上海转到小无锡，这一年半的“拉锯”，是唐先生矛盾选择的一次集中体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6日起，上海的学生运动便时起时伏从未间断。对此，唐先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位校长教育家，他在立场上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军阀；另一方面，作为理学家，他深以为学生参加运动不读书会荒废学业，且有生命危险，反对学生。^[5]¹⁸⁹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离京赴沪。唐先生也于1919年两次向交通部提出辞职，1920年3

唐先生仕宦实为十五年，1907年8月离任赴沪。

月再次辞呈者三次,而5月复临校视事,就校长职。直接原因是交通部员尤桐劝留书中透露交通部长有停办罢课学校的决心:“恐辞呈既上,而解散之令立下。是我公之于诸生,本欲爱之,适以害之。此诸生中有本年即须毕业者,有来年即须毕业者,设因解散而坐视无所依归,举公十余年来所苦心孤诣经营缔造者,一切付之东流,度必非夙爱生之公所忍出此也。总之,公留则校存,公去则校停,校之存亡系公之去留。”^{[5]192}唐先生调和其内心矛盾作出选择时的标准便是学校和学生,学校是其心血所凝,学生是其爱心所向。

1920年秋季学期,唐先生在学潮持续的情况下,继上两次交通部辞呈。在第六、七次辞呈之间,1920年十月初三,径直回锡坚不再出。直至年底交通部同意去职。这次原因唐先生写入《自订年谱》有四端:学潮之后,学风不靖;吾父老病;目疾日深;精力日衰。如同前次复回校视事一样,一出,皆由学生。1920年4月,学生投票表决是否挽留唐先生,以292票对129票决定挽留。^{[5]191}1920年10月初(8号以前),学生仍以投票表决是否挽留唐先生,缺席44人,中立17人,以413票对153票反对挽留。为何如此逆转?其时唐门弟子金易占说:唐先生“去任那一年的国文竞赛,正好在星期天举行,学生大为不满,认为休息日不当要人写文章。他得悉之下,含着一肚子气跑回家,此事也成为他去任的原因”。这一年的国文竞赛按常规是孔子诞辰日的前一个星期天,当为1920年10月4日,因为10月8日是孔子诞辰日(农历八月二十七)。《自订年谱》十月初三回锡为阴历,即公历11月12日。可见唐先生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辞职的最直接原因是学生抛弃了他,尤其因为孔子诞辰日的国文竞赛而导致的不挽留的票决,这使得他觉得再留职便毫无意义。这两件事的连锁反应彻底突破了唐先生的底线。作为教育家,学生不要你了,那学校就不是你的了。作为理学家,一生尊崇孔子,精研孟子,服膺朱子。国文竞赛定在孔子的诞辰日学校十多年来相沿成习,今此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对之声,辱及教师校长自身还连累孔子,这是唐先生的绝望处!唐先生其后在无锡国专授课,乘轿路经孔庙,虽双目均盲也必下轿步行过孔庙后复登轿,守古礼也。

守古礼的唐先生是理学家,理学家根本不在书本文字,而在生活,而在人生的出处大节。从上海的公立大学转向无锡的私立学馆,在内心矛

盾取舍中,他选择了退守,是在绝望处寻找新的希望。因为这次退守的原因只有一个:学风不靖。这个原因与学潮迭起无关,5月重莅校行校长职,便说明后来决意不出不是因为学潮,更不是因为父病目疾体衰,因为之前有私立无锡中学之创,其后立即创办私立无锡国专。《自订年谱》称自己是无锡中学名誉校长,而从其后面详述订定章程、聘任教师、规划招生,均可见实在就是校长。唐门再传弟子徐忠宪则更加明确说:唐先生“欣然同意担任校长,并且表明担任校长纯为义务,不受薪金”^[6]。而创办无锡国专则是唐先生亲力亲为。可见,学风不靖才是让矛盾中的唐先生作出选择的真正原因。作为教育家,他也理解学生,不会站在军阀的立场压制学生,同样,更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民主选择;作为理学家,学生厌弃了作文进业,并且不敬师尊辱及孔子,德便是不修了,既然学生不能修德进业,师弟关系便再无存在之必要矣。这是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所不同的矛盾取舍。唐先生心底装着两个“鬼”:一个是传统士人的理学家之“鬼”;一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教育家之“鬼”。

如果说唐先生从工业教育先驱转向国学教育大师是理学家之“鬼”劝降了教育家之“鬼”的话,那么,唐先生从一位晚清官员转向现代教育家,则是现代知识分子之“鬼”战胜了传统士人之“鬼”。任何一次人生转折处的选择都有一个过程,都是内心两个“鬼”很艰难的决斗。

从官场决意抽身出来,尤其在自己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情况下,那是需要勇气和先见之明的。有论者以为唐先生深感到国事无望,京官难当,于是慨然应允来沪就职。^{[5]117}也有论者以为唐先生目睹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我国,清廷腐败无能,多次上书无果,幻想破灭,于是借母丧出京不归而赴沪任高等实业学堂监督。^{[7]364}更有论者以为他出于对时局的无奈和对政局的绝望,历经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事件,再经义和团运动及与袁世凯的冲突,选择了弃政而转身教育。^{[8]21-26}其实每一次艰难的选择都是一段时间的诸事积累而成的情绪爆发,唐先生在仕途顺利的过程中目睹了国家的沉沦,眼前自己的升迁与心底对国家命运沉落的理性判断始终在折磨着这位理学家。这次转

金易占:《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六辑,1966年版,第25页。吴淞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也注意到此篇回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折之始是在1900年。

首先是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城的种种劣迹,这是他决意离开北京和政治的首要因素。我们看《自订年谱》中的追记:1900年“四月,北京义和团祸作。义和团为八卦教流派,邪教也。自言能避刀、枪、火炮,以仇洋教为名,焚烧杀掠。初起于山东,巡抚袁蔚亭名世凯禁之,而山西巡抚毓贤加以提倡,遂蔓延至直隶。总督裕寿山名禄,阴袒之,势益张。时皇太后甚恶西法,欲集合其力,以驱外人,各国公使啧有烦言。大臣许景澄、袁昶上疏力争之,俱留中不报。五月,义和团遂纠合大众,拆毁铁路,直入京城,围攻使馆及西城西什库教堂。时余家尚居新开路,与比国使馆相近,见火光烛天,枪炮声累累如贯珠”。再则:“拳匪扬言总署通洋人,盖意图劫掠也,总办诸君互商白庄王,即请义和团守卫本署。某日,余赴总署,同事者无一人。余饭毕散值,已出署矣。瞥见大队义和团约数百人,首裹红巾,手持白旗,大书‘扶清灭洋’四字,自西而来,蜂拥入署。署中苏拉(即茶房),急追余车,谓义和团至,须招待。余因折回,立大堂中,招呼之。旋至西厅,见所谓大师兄者,系满洲某。腰系黄带,怒形于色云:‘贵署堂官无一人,司官仅足下招待,何故?’余曰:‘本署系兼差,堂官午前均赴各部,午后始克到署,请暂待。’某云:‘吾观署中妖气极盛,闻同文馆洋书极多,均须烧毁。尚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吾先告足下知之。’余曰:‘本署系奉文宗显皇帝谕旨所设立,因与洋人交涉,故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一事,却须斟酌。如果奉有上谕,自当遵办。惟杀人自有地方,应由本署交出,依法办理,却不能即在本署自由杀人!’某语塞,乃云:‘吾为足下焚香升表。’表上升,某云:‘足下却是好人。’余付之一笑。旋许公竹箒到署,余往禀白一切。复随同往见某,亦为许公焚香升表。有顷,同事满洲文某来,素信义和团之人也。余与接洽后,急散值,归已薄暮矣。是后,义和团戕杀教民甚夥,闻之极为痛心。”可见,当时的北京城因义和团运动已经乱成何种状况了。“以仇洋教为名,焚烧杀掠”,这在唐先生眼里是忍无可忍的,现在的史料也表明义和团当时所杀戮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9]。尤其是唐先生亲历在部署中义和团首领的愚昧,“付之一笑”,

这是痛心苦笑。国家以此乌合之众抵抗洋人,如何有希望?此其一。其二,忠良干臣遭酷刑以致斩首于菜市,《自订年谱》:“七月初一日(7月26日),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也。惟时总署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探视。至初三日(7月28日),奉旨置二公于法。闻二公临刑时,神色洒然。监斩者为大学士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亦附和拳匪者也。袁公戟手骂徐曰:‘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许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从容就义焉。呜呼!自我圣祖、世宗以来,未尝有杀戮忠良之事。此时许袁两大臣被祸,盖国家元气因此大伤,而人心亦自此渐去矣!”以至在十月又追记:“奉旨昭雪许、袁、徐、联、立五大臣冤案,开复原官。旋许、袁、徐三家属盘桓回籍,各使馆派兵送行,仪仗极盛。总署诸同人设灵路祭,有泣下者。余作《五忠诗》吊之。袁公诗结句云:‘流水高山今已矣,天涯何处哭钟期!’盖不胜知己之感也。后外交部陆子兴总长建四忠祠于署后,刻余诗于壁间,以资纪念。自是余夜间常梦许、袁两公被刑状,辄大哭而醒,泪渍枕上,盖肝郁目疾愈深矣。”唐先生素来不作诗,陈衍在1931年应聘无锡国专夜宴诗歌唱酬,唯唐先生不作诗,《石遗室诗话》卷一第二九条:“前岁余至江南,太仓唐蔚芝尚书(文治),壬午同年也,长无锡国学院,请余讲学,招饮并侑以昆曲。即席赋呈,蔚老不为诗,哲嗣谋伯(庆诒)和韵云:‘绝似当年庾子山,江关词赋霸骚坛。欣逢旧雨皆知己,竞逐流霞各尽欢。檀板红牙催玉漏,松云白首挂华冠。秋来风雨虽如晦,尚有豪情赴笔端。’雅切工整,的非易才。余与君尚各有叠韵云。”^[10]可见写《五忠诗》时的唐先生内心是何等的郁结无奈痛苦。许竹箒(景澄)和袁爽秋(昶)被冤斩对唐先生的刺激极大。其三,唐先生在1905年跟袁世凯之间发生的矛盾只是个人之间政见不一而已,完全不会影响到唐先生决定出处,吴淞南所辩有道理。^[8]^[21-24]1905年连上两折被留中才使得唐先生彻底绝望。《自订年谱》:“维时官制窳败,事权不一,动多牵制,爰拟《请改定官制折》。奏上,留中。”“时因风气日开,外侮日亟,穷变通久,不得不为先事之谋。爰拟《请立宪折》,奏上,留中。振谨案:此折载《茹经堂奏疏》卷三。先生自注云:‘上此折时,以为切实施行,可挽危局,不意因循敷衍,数年之后,竟致沦胥。呜呼!其可痛矣。’”这是关于官吏体制改

革和政体改良,这是唐先生两次东西洋考察的思考。《自订年谱》在1901年赴日时记曰:“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虽系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内阁。近年以来,一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駸駸乎日臻富强。其民外和易而心计极工。然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占农田颇多,米价腾贵,亦可虑也。”1902年在考察西洋时除留意学校而外,特地“六月初八日(7月12日),赴法京。旋考其议院制度”。因此,在1905年关于吏治和政体改革的两折被留中,唐先生就已经绝意仕途了,这由他在1926年编订《茹经堂奏疏》时所加注语可以知之。由此三者,为何延宕到1907年唐先生才选择退出官场呢?应该说,母亲去世是“最后一根稻草”。从沪上工业专门学校离任前一年,1919年农历五月,他的小女儿,也是他唯一的女儿早殇,《自订年谱》:“五月十七日(6月14日),女庆婉以惊风殇。婉儿生六岁,尚不能行走,平日食乳不足,体弱可知。然是儿极有情意,昙花一现,曷胜痛心。”而在1906年的腊月:“至二十一日(1907年1月19日)辰刻,吾母竟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这两次亲人的痛失是唐先生最后转身改变人生路径的情感原因。

转身教育的唐先生力图以振兴工业教育来挽救自己尚存一丝希望的大局,来报答晚清政府对他的恩德。对待朝廷的态度,唐先生始终是矛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唐先生心底,慈禧和光绪的皇恩浩大,臣子必须竭尽一生而报之。《自订年谱》:1904年“六月中,在颐和园召对一次。皇太后垂询商务甚详,并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此后召见,迭蒙温奖清廉,闻之悚惕”。再“是年,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文治每感极而叹曰:‘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何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叹息了三年的唐先生在母亲去世的伤痛中,又逢1907年五月“是时立宪并未实行,大局岌岌可危。南皮张香涛制军名之洞,项城袁慰亭制军名世凯,皆入赞军机。余叹曰:国力尽矣”。于是离开政坛,离开北京,因为此前有拟任北京实业高等学堂监督之荐,坚辞之。又有北京贵胄学校监督之议,亦婉辞之。

在矛盾中,当某一点的情感之火(如唐先生的母女之丧)点燃后,人便有可能涅槃而生。从已经感到无力面对的政治舞台退出,重新开始另

一种人生——教育征程。在教育实践中的选择会比政治出处的选择容易吗?未必!因为,那个时候恰好社会转型直接推动了教育转型,晚近时事多艰的教育转型中,唐先生是一道峻峭的风景。

二、晚近时事多艰的教育转折

历史的叙述常常需要一个节点,当然,历史是连续的,即便以政权的更迭来划分朝代,似乎也越来越显示出很多问题的难以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野处在什么时候,愚以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转折节点是1905年的科举制终结。

若如前揭,人生的命运是性格,那么,更为完整地说,人生的命运是性格和时代的合力。唐文治从晚近到新中国成立的教育人生的命运是他的性格和那个时代的必然。唐先生早在1894年《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中就提出了科举考试的改革。教育改革有两种路径,从考试开始的,为突然扭转之法,从上到下,最为有效,而且,每一次改革变化都带来社会文化思想的嬗变。隋代而起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带来了诗文的隆兴和理学的勃发。科举制度的停止,才迎来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及白话文的成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这次变革之前十年,唐先生提出:“曰宜拔真才、变科目。国家以制艺取士二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其本意固将使学者沈潜于义理之途,反而体之于身也。乃臣默观近科文章风气,牛鬼蛇种,变幻百出,剽窃子集以为古,摭拾僻书以为奇,纵横之机,蘖芽已伏。臣惟文体之败坏至此,窃恐变本加厉,日后必有议制艺之诞谩不足学,不如变而为西法者。夫士生今日,诚不可不习西法,然使专习西法而废制艺,则缀学之士势必束‘四书’、‘六经’而不读,举周公、孔、孟之微言大义礼法制度,所以维系人心者一切唾弃净尽,则中国之去人伦、无君子,其几盖不远矣。故臣窃尝私议,以为欲士之明义理,则不可以废制艺;欲士之应世变,则不可不习西法。今者科场之中,第三场对策,实为无用之赘言。臣于此中颇知甘苦,其号为能手者,亦不过敷衍曼词,扞撻琐节,于经世之学,实乃去以千里。今拟变通取士之法:首场试以四书文二首,经艺二首,务须发挥义理,无取怪诞。二场则试以舆地兵学,

王德威所著《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卷首前言题目便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自中国及外洋各国疆索，均宜讲求；一切攻守之策，并宜探讨。其有曾经身历而目验者，复于复试时详加考核。三场则试以制造器械之法，与夫测量勾股之学。如此则既有益于时务，而仍足以维系乎人心，二者可并行而不相悖。臣非不知变经策为洋务，不无得罪于名教，然与其俟数十年后，斯文扫地而无余，不如于今日先为变通，则先王之教泽，犹可留贻于一线也。且臣闻天之生材，必本于五行之性，其得清明之气者，则为纯粹之士，其得坚强之气者，则为瑰奇之士。近年以来，中国民穷财尽，里塾党庠，月廩绵薄，其闲纯粹之士，尚能闭户读书，不与世通，而瑰奇之士，负其磊落不羁之才，一见摈于有司束修之问，或出竟楚材晋用，尤为肘腋腹心之大患。今诚变通科目，既令纯粹之士有以自修，且令瑰奇之士有以自效，其为利益，殆非可以言罄。然使陛下以臣之言颁示廷臣，议其可否，则必以为不便。何也？彼当轴者固未尝素习乎此也。臣不敢欺诳陛下，平日所学，亦未尝素习乎此，而今以此言率然陈于陛下之前者，诚以综观今日之势，非士习西法，则终不足以自强，夫君子固不可以己之所不能，而遂谓此事之当废也。此臣所谓亟于施行者五也。”这是著名的令翁同龢、沈曾植诸老为之涕下的《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中第五项改革建议。因为这是唐先生对教育的最早论述，也是后来唐先生教育实践始终未变的思想，因此不避繁赘，移录如此。由此可看出唐先生的教育主张：一、教育是培育真人才即有人伦的君子；二、熟读儒家经典，而体之于身；三、学习西法，考核经世之学；四、变经策为洋务，察之理工自然知识。此四点，后两点率先落实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工业专门学校的探索上，前两点执着于三十年的无锡国专的坚守。

这是在社会裂变未来临之前的改良方案，唐先生希望教育通过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科目慢慢转型，这是温和的。他首先看到以科学为主体内容需要增入教学的教育改变，这一体认经过后来两次东西洋的教育考察，再“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和维新变革潮流的感染，至19世纪末年，唐文治已经形成了‘学堂之在今日’不容不设’，研习西学关乎‘世道’‘人心’的思想观念”^{[5]381}。这一次改变使得他以任职农工商部为平台的特殊身份，“1904年至中华民国成立7年内，为了救亡济时兴学育才，他先后主持或创办的新式教育机

构或教育组织几近10处之多”^{[5]387}。应该说，唐先生是在准备好了教育思想之后才进入教育实践的，他放弃了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和贵胄学校，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远离政治核心利于教育改革，选择经济发达城市利于学校发展。

在步履维艰的晚近政局语境下，唐先生内心的矛盾状态在其实行教育实践探索的公私两所大学的办学历程中越发凸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学宗旨，国学育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时代精神在唐先生教育生涯中投射出的教育拓新与坚守。^{[11]4,5,63}

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工业专门学校的改变中，学习西学成为他最重要的教育色调。开创工科教育成为先驱，史有定论，唐先生之于交通大学的意义，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而论及科学工科教育的引入和办学中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唐先生丝毫不逊色于蔡元培。民国元年（1912），在改名为南洋大学的办学中“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亚”^[12]，“而且专科课程设置均以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为蓝本，甚至教科书直接购自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竭力使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学识水平。同时各教学环节也以西方学制为参照系而不断提高”^{[5]163}。这是西学为用，是唐先生学习西法考察经世之学的教育观念的转折。

中学为体，始终是唐先生教育观念的坚守。自1908年始，主持设立国文研究会，举办每年一次在孔子诞辰日的前周末的有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即国文大赛），至1920年，13年从未间断，唐先生亲自参与命题阅卷颁奖。唐先生认为“国文者，国民之精神”，“国文弊则精神亡，爱国货者，先当维持国文，此读国文为救世之第二事也”。因此，在阐释高等实业学堂办学宗旨时，他郑重说：“并极意注重国文，以保国粹。”^[13]这一逻辑始终贯穿唐先生的教育实践，这是中国教育转折处的一种坚守，所培养的人首先是中国人，因此要有中国精神，要有中国精神就要读国文，只有培养这样的中国人才能“救”中国现在的“世”（社会）。后来创办无锡国专更是将这样的逻辑扩充为教育实践的主线。

一个学校兼容并包，这需要校长的胸怀。一旦提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往往以蔡元培为代表。其实，在民初大学中这是一种常态，只是蔡元培将其提炼出来作为办学方针而已。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坚守国文,工科西化,这是一种兼容并包。同时,成立了国文科,开我国工科大学开设中文系的先河。^[14]而在1910年冬天,还聘请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教务长。辜氏思想保守,在一年之后的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在课堂上号啕大哭,学生视为反动保皇,群起而围攻这位长辫子学者。唐先生为之解围,并提出,应该尊重每一个师生的思想自由,不可不守师道尊严。此事消停后,辜氏辞职离开实业学堂。钱师仲联曾说唐先生曾言及此次劝解了学生之后便为辜氏介绍北京大学任教去了,辜氏于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钱师所言者惜无文献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唐先生不以自己的主张而排斥相对甚或相反的师生的思想自由。在清帝逊位的问题上,唐先生本身是矛盾的,伍廷芳的电稿他是签名的,于是遭来两位恩师王祖畚、沈曾植的责备。^[15]《自订年谱》:“庄君思缄来,出示伍廷芳等电稿,请求皇上逊位,邀余列名,余叹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遂附名焉。后王师深咨余,以为不应列名。沈子封师亦深以为非,见于辞色。后数月,俄国革命,俄王尼可来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这一选择当然可以认为是唐先生的革命的表现,但更应该认为是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与对清廷恩遇的矛盾思想的最好协调。孤臣的耿耿之心表现不同而已,能够包容他人固然伟大,能够包容自己矛盾的内心才是至为伟大者!

兼容并不代表没有坚守,唐先生的兼容是首先有独立的内心坚守。晚近教育史上除了办学方针的转折之外,更为重要的便是文化思想的转折在教育中的投射,读经的讨论便是一次集中的体现。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松,向全国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发出了“读经”问题的意见征询,收回七十多篇文章,1935年5月10日,《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作为特刊印行,这是一次教育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16]附录一显然,在赞成、反对、相对赞成三派的观点中,唐先生是最为激烈的坚持读经者,他是绝对赞成读经的。其时,唐先生已经七十岁,正在无锡国专坚持讲经。唐先生的意见认为:“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并且申说:“读经责乎

致用,而致用之方必归于躬行实践。故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一一反诸于身,验诸于心,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俾脑经清晰,气质温良,学道爱人,方有实用。若徒矜考据,鹜训诂,自命奥博,浮泛不切,或好立新义,乱名改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至于实事求是之法,尤贵有恒。若试行一二年后,动辄更张,学生耳目淆杂,无所适从,亦决无成效也。”^[16]随后便列出从小学到大学的读经规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所谓的读经与一味地死守经义背诵经文是两回事,他更加强调整将儒家经典的要义内化为一个人的君子之心,后人以为唐先生的读经坚持是保守的,那是没有读懂唐先生的思想。^[17]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实学宗旨,教育要面向培育人的实际时代和社会。因此,唐先生的经学不同于乾嘉诸老,也不同于程朱理学陆王新学,他是晚近学术史上的经学思想的新变,这一新变投射在了教育上,便是用中国文化传统的经典著作,以优秀的教育传统方式培育中国新民的凸显。唐先生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转折性教育家,正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学问家,才会在那时事多艰的“十字路口”探索出一条泥泞之途。

三、文化传统教育的教材探索

唐文治作为经学家没有固守在一间小屋里,也没有将自己的经学研究固守在只有一二素心人才去读的几张纸头,而是以经学家的学术做教育的普通之事。在中国文化教育转型的“十字路口”,原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以教材形式呈现,似乎至今也没能解决得很好。唐先生的《十三经读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教育的教材探索。

《十三经读本》是唐先生在精心搜罗《十三经》善本之后汇总而成的。唐先生并以《提纲》,附以《大义》,亦如前述,辑录前代诸家之说,自己撰写评点、札记,“写焉成帙”。《十三经读本》中可谓倾注了唐先生大量的心血,其中也自然体现了唐先生的治学理想和治世态度,是唐先生经学思想的集大成体现。此为《十三经读本》的意义其一。《十三经读本》作为一本经学教材,不仅是唐先生经学理念的汇总,还为经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此为意义其二。唐先生秉持救世之道,

关于《十三经读本》的渊源、背景、体例、内容和之于当今高等教育的意义的论述,参见:茆萌、陈国安:《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 论略》,《学术界》,2016年第5期。

力图以经学启民智,以经学强教育,以经学救国。因而《十三经读本》也蕴含了其对教育和社会的意义。

《十三经读本》是唐先生经学思想的直接体现。唐先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在教育理念、经学研究以及经济致用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作为教材的《十三经读本》,其首要意义即是体现了唐先生的经学修为及治学理想。读本内容的选择、编排、校订和评点,经唐先生手订,每一个环节都有唐先生经学思想的凝结。读本的《提纲》和《大义》则更是唐先生明确的经学宣言。

唐先生一生,虽有欧洲游历的经验,也有对政治改革的倡导,甚至直接长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但是其对于经学的坚持是贯穿始终的。在唐先生执校阶段,南洋大学的国文课成为一时之热门。在其退隐无锡国专后,仍坚持返回上海交通大学,为历届学生作国文、经学的讲座。唐先生对于经学的推崇,不仅体现在其身体力行上,还体现在其对经学系统的思考上。在近代经学存废的讨论中,唐先生的意见如前所述,他曾在“意见”中提出详细、具体的经学教育的设置和安排。唐先生有言:“初级小学三年级应读《孝经》,高级小学三学年应读《大学》及上半部《论语》,初级中学三学年应读下半部《论语》及《诗经》选本,高级中学三学年应读《孟子》及《左传》选本,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18]1409}从初级小学直至大学及研究院,唐先生对学生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读经作了详细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我们发现唐先生依据自己的经学修养和治学经验,将《论语》上下部分别纳入高级小学以及初级中学两个部分中。这种安排不仅需要自身的学养,还需要对学生每个阶段的知识储备和学习状态有很明确的把握。从中足见唐先生之良苦用心。对于经学之存废之所以兴起讨论,问题不仅出在时代、社会之中,还能从经学自己的发展找到根源。就此,唐先生就“读经所以无系统者”作了详细的分析:“一程度浅深,极难支配;二难得通达之教师;三难得显明易解之著本。以上三层,以得善本为尤要。盖既得善本,教师即可循是以讲授,主持教育者,即可循是以核定功课。”^{[18]1409}对于经学的精确掌握以及对于教育各类主体、各个环节的准确把握,让唐先生很明确地分析了读经的难处。也是由此,唐先生以“善本”为读经之必

须。有“善本”,教师即有思路可循,学生也有本可依。

邓国光曾在讨论唐先生从事古文教学时谈到,唐先生强调诵读,强调“起承转合的微妙变化”,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自觉澄清了自己的限制与浑浊,以古文养心,以诵读养情,以醇心为极致,至此成就顶天立地的人格,而文章以至情而发,足以通感天人,经纬天地”^{[19]1779}。此论虽仅是针对唐先生的诵读而谈的,但完全可以作为唐先生经学实践的总结来看。以古文养心,继而成就“顶天立地的人格”,以文章通感,继而经纬天地,恰是对唐先生的经学努力作的注解。而凝聚唐先生心血的《十三经读本》与其对诸经的探讨文章一道,成为他思想集大成的体现。

《十三经读本》是经学传承的重要环节。《十三经读本》作为一本经学教材,对经学的传承、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读本的形成与唐先生有很大关系,在读本完成的背后,唐先生对经学不遗余力地推广也让读本加深了其经学传承的意义。

在唐先生的论著中,几乎处处都存有推广经学、传承经学的内容。其如《钱塘施公省之墓志铭》中论《十三经读本》的刊刻过程及思路,《学校论》中“二曰读经书”节讨论经书针对各个阶段学生的指导,《文化论》里谈及经书对于学校、教育乃至文化、国家之影响,《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以经学内容训导诸生。此外在《国文大义》《中学国文新读本序》《废孔为亡国知兆论》《施刻十三经序》等文章中均标举经学,强调经学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在《学校论》中唐先生谈道:“《十三经》者,我中国之宝也;《五经》者,宝中之精而尤精也。读《易》,而知阴阳消息,进退存亡之几焉。读《书》二十八篇,而知唐虞以来治化之迹焉,陈宝大训,贵重无逾于此矣。读《诗》而知列国之风俗、商周之所以兴焉。读《礼》而知三千三百之遗、至德凝道、德性问学之奥焉。读《春秋》而知尊卑贵贱、善善恶恶、命德讨罪之权焉。盖修身、治天下之纲要,悉寓于是矣。”^{[20]190}他悉数列举《五经》的利处,是为了向世人明确经学的地位。在唐先生看来,《五经》即我国之经典,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甚至连“欧美之人”都知道我国的经典,而我们现在却意图废而弃之,实在是“怪且异哉”。他甚至以各国学校为例阐释,只要是奉宗教者,“靡不诵《圣经》”,而今我国之内,有《五经》之经典,却不知读,以至人格日卑,

品行日坏。唐先生搜集《十三经》善本并编排《十三经读本》的初衷就是指导读经,希望能传衍经学,让治经者得其门径。唐先生尝言:“纵览《十三经》、《二十四史》,无论治乱贤奸,所以彰善瘅恶,衷是去非者,皆前人精神之所寓。先圣先贤以精神递传于吾辈,吾辈即以精神递传于后人。夫如是道统事业绵延而不绝,然则吾人可妄自菲薄乎?”^[20]^[84] 他以《十三经》中蕴含了前人之精神,先贤圣人之礼德,而当代的经学研究者必须完成传递的事业,让道统继续绵延下去,将先贤、吾辈之精神传递于后人。

《十三经读本》恰是唐先生推广经学、传承经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其传承经学的意义还在于读本本身一些与时俱进的特点。唐先生不仅广搜善本,编排原典,还在原典之上,作标注和评点,以自己的经学体悟帮助经学学习者们研读艰涩的文章。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抉其微言,撰写《十三经提纲》附在诸经之后,以提纲之现代作文之法来适应时人尤其是青年的阅读习惯。在读本中虽然有很多唐先生的阐述和总结,但是他并没有对原典进行修改,而是保存经典的真实内涵,原汁原味地滋养学子。他的阐述也时刻注重把握青年人的话语习惯和阅读习惯,并不以艰涩难懂的辞藻作解释,而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诠释。与此同时,唐先生还在繁忙校务、教学之余,四处奔走,向青年学生宣导读经的方法,指出“只有本文熟读而精思焉,循序而渐进焉,虚心而涵泳、切记而体察焉,则圣道之奥,不烦多言而解矣”。此外,为了宣传经学,也为了更好地记诵、理解原文,唐先生自创“唐调”,将经文放到固定的调式中吟咏。在他看来,这种性情的教育是结合了读、诵及个人体悟的,而其中读又占很重要的部分。唐先生在《国文大义》中有言:“盖文章大道,所以盛者,实在于声,所以和声乃可鸣盛也。”

唐先生以其经学各法让《十三经》在当代的传统文化呈现中确立了地位,并借由自己的体悟、阐释以及吟咏,赋予其当代的意义和精神,并继续传衍下去。以先贤、圣人之精神传于后人,真正让这道统事业绵延而不绝,是为《十三经读本》的意义之二。

《十三经读本》作为教材旨在匡正世风,教化民智。《十三经读本》除了具有经学传承之意义外,还对教育、社会之发展有着影响。唐先生之所以推崇经学,其一是为了经学的发展,其二则

是为了社会之发展,经学不仅是书本文章,更是体用之学,讲求经济致用,能以其独到的精神匡正世风,教化民智。

唐先生曾在给交通大学学生演讲时提到经书应当做到正人心,救人命。在民国二十年(1922),唐先生为《朱子节要》一书作序时,又加一“立人格”,唯有至此,才能开物成务而胜天下之艰巨。他曾明确指出“学”的起点关怀在人伦,是谓家庭伦理,乃“学”的根本。^[21]^[139] 从道德出发,从学问出发,经学沿着“明义理”“通训诂”“阐圣门之家法”“穷天德圣功之奥”^[22]^[2] 的思路从文本走入了社会之中,从而成为通经致用的法宝。唐先生曾在为无锡国专订立校规时提到:“本诸《十三经》以正其心,本诸《二十四史》以考其事,本诸汉唐以来文集、奏疏、函牒、言论以广其见闻,养其知识,庶几文化渐渍于人心,国家可得而理欤。”^[20]^[194] 从中我们发现,他从《十三经》出发,借由历代之文书、言论增广学生之见闻,积累其知识,进而不仅要让文化渐入人心,并希望借此种文化治理国家。

及至世风日变,唐先生意图以经学救世的态度更为明确了。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唐先生频繁发声,希冀能以经学之振兴,实现国家之复兴。《施刻十三经序》中他以秦之焚书坑儒为例谈道:“秦时之书,焚于有形,而今世之书,则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今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横政之所出也,横民之所止也。”在他看来,现世无形的坑恰如秦时有形的坑,横政、横民较之秦时并未消歇。要解决此种状况,唯有循着人心而去,求得国之根本。而此种根本,即是经学,即“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23]^[212]。在此基础上,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以及“废经”呼声愈烈,唐先生也在不断强调经学救国之必要。其如他在《废孔为亡国知兆论》中有言:“道德为立国之本,道德既丧,国本拔矣。文化者,国宝也。我中国数千年之文化,皆赖孔子为之祖述而宪章,为之继往而开来,为之发扬而光大。”^[24]^[1193] 其中,他明确了文化、道德、国家互相的影响,国家发展依赖文化,而文明之传衍“皆赖孔子”。在《孟子尊孔学题辞》中,唐先生将这一思考细化,论到“欲复兴中国,必先复兴孔子之精神,欲复孔子之精神,在教师能讲经,学生能读经”^[25]^[1641],将孔子精神之复兴与读经讲经之关系、教师与学生之所

当为都作了明确阐述。在《读经救国论》中，他进一步点明了经学、道德、社会之关系：“经者，常道也。知常则明，明常道则明是非。政治、伦理之是非，于经中求之；理财、教育、兵事、外交之是非，亦于经中求之，如丹素之判，如权度之齐，如化雨之苏庶汇，如医师之有良方，活人以此，活国以此。”^{126 1790}在反复强调之中，唐先生抽丝剥茧，将社会道德与经学之牵系一一明确，将理财、教育、外交等诸事务置于社会道德的影响之下，并由此来解读一国百姓之死活，乃至一国之死活论。由此，唐先生所编纂的《十三经读本》所倡导的复兴经学说，恰对一国之教育、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唐先生《十三经读本》的构画给了我们从“虚”到“实”的线索，将经学融入社会功用当中，将文史精髓化用进新时代发展的意义中。《十三经读本》的意义并非教材之于高等专科课堂的意义这么简单，实则是经学、文学之于社会发展意义。唐先生一生坚持学以致用。他所讲求的用不仅是文史的功用，而更多的是文史之于社会的功用。他将高校文科课堂的阵地和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当中，以社会所用为治学要求。从他《十三经读本》的编纂以及实际成效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功用已经走进了课堂当中。学生在《十三经读本》里也并非只读得了古人的“圣贤书”，而求得了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治学选择。

四、无锡国专卅载的百年回响

《十三经读本》议刻于无锡国专创办的第一年，历时三年，唐文治与无锡国专最初的师生一起完成的经学教材，无论是在现代教育史上还是经学史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十三经读本》和无锡国专一样既是传统的，又是新生的，都是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变革时的独特现象。

1920年，唐先生先后创办了私立无锡中学和私立无锡国学专修馆。把中小学与大学连在一起构想课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无论是在读经的规程上还是在学校的一体化管理上，唐先生都有自己的坚守。在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时，中央政府为节省经费提出高等学堂裁去中小学的动议，唐先生则曰：“本校长忝任校务，尝考世界教育状况，有以大学而建设中学、小学、幼稚园三级者，美芝加哥大学是也。”^{127 1104}可见在教育问题的讨论上，唐先生是以欧美和日本为标

准的。两次东西洋的考察学校，在其《自订年谱》中追记甚详，而在替载振捉刀所撰《英轺日记》中更是将教育问题的思考述之极详备。一个有着教育新思想的开明官员，经过了十三年的工业专门高等学堂的办学之后，竟然创办了另一个与之完全不同质的国学专门高等学堂，这是一个奇迹。

钱师在回忆时说：“办学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前清翰林徐世昌打算通过该校招收一批旧学根柢较好的学生，为政府培养秘书人才。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和来头，致使这所小型的私立学校在开班招生时，竟然要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设立考场，报考人数乃以千计。首届录取36名，分别来自江浙皖赣京津及两广等全国各地。”由此可见，无锡国专的创办起初就不是为了培养专门的国学研究人才的，而是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的，因此唐先生所订立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就显得尤为可贵了。“学规”首条便是“躬行”，这是唐先生一贯的教育主张，识字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躬行”。《自订年谱》述及他在英国考察时一事可为佐证：“旋又游英京大藏书楼。楼中书架积长三十二英里，度藏各国今古图籍三百余种。东方书籍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典坟，虽不尽备，然亦十得七八。殿本《图书集成》、《西清古鉴》皆有之。法国翻译微席叶陪余偕往，谓：‘中国素号文明，今先生来游是邦，见欧洲识字人多乎？抑中国识字人多乎？’言辞甚露骄色。余应之曰：‘欧洲识字人固多，然中国识字人贵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谓识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人固少，谅欧洲亦不多耳！’微有惭色，载大臣以为知言。”唐先生对于无锡国专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出路是清楚的，提出“躬行实践”作为第一学规，有其救世的宗旨。其于“躬行”条曰：“人生世界之内，以礼义道德为根本，窃尝譬诸人之学问，尤墙屋也，礼义道德，尤基址也；若无礼、无义、无道、无德而徒以学问为饰观之具，一旦品行隳坏，名誉扫地，是尤基址不固，墙屋坍塌，其危险何如矣。诸生既经有志来馆专修，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考试设立四地和录取人数似有误，详见：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7页。

平日读书,皆当体之于心,返之于身。倘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如陆清献所谓‘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每逢讲说,仅作一席空谈,而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20]259}辞严色厉,百年后读来也令人生畏,而教育在引导规范学生躬行礼义道德的问题上不应该有此敬畏之心吗?这一敬畏之心是要求将来去政府做秘书的人,这就更加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了。愚以为一个社会对于礼义道德的躬行最后的防线便是教师与公务员,一旦教师和公务员的群体在躬行道德礼义的问题上堕落了,那么这个时代社会的堕落也就为时不远了。教师的道德礼义的恪守会影响孩子的精神成长,言传身教,身教甚于言传。公务员的道德礼义的恪守会深刻影响所有公民的行止,因为他们是维护社会道德法律的标样。虽然后来因为徐世昌的倒台,第一批毕业生也没能够按原来的承诺进入中央部曹各县知事,大多数成为了中小学老师;但从无锡国专十五年纪念册印行时的毕业生统计来看,党、军、普通行政、专门行政和文化机关的毕业生总数相加,占全部毕业生总数的18%,大中小学教师为54%。^{[20]218}这个数据唐先生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的办学仍然坚持以“躬行”为首,以“挽救世风”为终,订立学规,其“正人心,救民命”的思想就需要重加考量了。

作为一般公民的培养那是中小学教育的任务,而大学堂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无锡国专是培养国家政府管理人才和中小学教师的,世风之如何,世风之是否可救,唐先生也许认为这两个专门人才的群体尤为重要的便是躬行修身,同时要有挽救世风的文化担当和责任。在“挽救世风”条曰:“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答之以‘尚志’。立志为学者第一关头,人能立志为圣贤,则为圣贤矣。立志为豪杰,则为豪杰矣。然近世圣贤豪杰不数数觐者,则由英俊之才,大都迷于歧途,而隳坏于习气也。曾子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则谓‘自任以天下为重。’顾亭林先生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也?盖孟子与顾亭林先生之意,谓学者自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人人不安其本分,不勤其职业,法守乖而秩序淆,则天下乱矣。故吾辈务宜独立不扰,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

至于无稽之谈,非礼之籍,自然不接于耳,不寓于目矣。诗有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今日吾国是何等景象?外人方讥我为无礼义、无教化之国,痛心曷已!剥极而复,当在此时。故吾学者共雪此耻,更顾吾国民共雪此耻也。^{[20]261}语出曾孟亭林,然而字字为当时所说,字字为这个社会良知的核心群体而说。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使命感的坚守之下,无论是在无锡还是在桂林、上海,无论是在太平时代还是在日夷构衅国难当头,唐先生总是以此十条学规约束自己,劝戒师生。1938年,无锡国专内迁至长沙,叶长青因为急于回闽当官,假传唐先生的意思,解散学校,幸有钱师来回沟通,无锡国专学生没有散去,而顺利到湘乡汇合在铜钹湾照常开课。但此后,唐先生绝少提及叶长青。^{[28]278}应该说叶长青在最初的无锡国专的办学上是有贡献的,但这件事突破了“躬行”和“挽救世风”的学规,因此叶长青“虽然在办理学籍时在学生中博得的好评,就此全部破产。唐先生常说‘知人不易’,以后他很少提到此人,也不提此事。^{[29]127}”

唐先生在无锡国专除对违背学规的师生不太兼容之外,在思想自由、宽容学生、学术兼容并蓄的办学理念上,成为一时大学堂的楷模,因此无锡国专历史上的教师阵容也是极一时之盛的。如学术旨趣和立场不同的章太炎也曾受邀在无锡国专讲演两次;同为经学家的周予同与唐先生的学术观点也是相异,唐先生照样聘其来执教;以至于顾实的与唐先生观点相左的文章《中庸郑注讲疏》要发表在《国专月刊》上时,唐先生看也不看直接说“原稿照登”。以至这位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国民党老党员顾实对陆景周说:“中央大学将我解聘,而唐校长能聘我,我佩服他是伯乐,能用人之才。今天我更佩服唐老有容人之量。国民党连我这个老党员都不能用,不成气候。”后来又对人说:“唐老能容鄙人,雅量不可及。^{[29]118}[安按:顾实(1878—1956),字惕生,江苏武进人。早年功习法科,曾在国立东南大学执教。通多国语言,深研先秦史籍,其著作有《汉书艺文志讲疏》《墨子·辨经讲疏》《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大纲》等。^{[30]183}而其著作多为任教无锡国专时的讲课讲义改定而刊出者。]

正是因为有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无论是学

叶长青,当时无锡国专教授,时为长沙无锡国专负责人。

生还是老师，在无锡国专的学习和教学的时候，其学术的成绩足以令自己满意。最可称述者，教师的教学直接催发了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且成为他们一生学术成就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除唐先生自己的经学著作外，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和《宋诗精华录》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经学通志》等均是他们的学术代表作。钱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宋诗选》和《梦苕庵诗话》等也是在无锡国专任课时时的讲义。先后讲宋诗的陈衍和钱师，分属近现代两代诗学巨擘。其所作宋诗选本，各有旨趣，皆为各自一部宋诗史也。先后在无锡国专以讲义梓行，真可视为诗学研究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再则如鼎鼎大名的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史要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在无锡国专“桂校”时的讲课笔记，同时的饶宗颐所讲的文字学等课程的讲义也成为其后来著作中的代表。而“桂校”办学更是艰苦。后来在“沪校”讲授戏剧史的周贻白，其讲义写定后即成为其学术成就的代表著作《中国戏剧史》。

有师如此，弟子必佳。无锡国专在内迁之前，毕业学生均有毕业论文的演讲，而且极为隆重。以第一届为例，侯堃《高忠宪易学》，王蘧常、毕寿颐《诗经之社会进化观》，吴其昌《性理学概论》，唐兰《整理我国古代名学之方法》等，这些论述都成为后来他们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基点。在无锡国专三年中，在书院式的讲课和专门的导师指点的学习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有专著写成，如晚期学生冯其庸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撰就《蒋鹿潭年谱初编》，王绍曾的《目录学分类考》也是作为优秀毕业论文以《无锡国专丛刊》结集出版的。

这样的师生之间相磨相切，才是大学堂应该有的风景。唐先生更是尤其注重与学生的问学互动，虽已双目皆盲，但逢学生论文批阅，均是眉批总评一丝不苟，令诸生动容者不在一二。钱师^[31]¹⁸³、王蘧常皆有回忆。王蘧常在《自述》中述及唐先生评吴其昌天中节所作《弔屈灵均文》效老杜语曰：“吴生吴生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28]¹²⁵吴其昌当场为之呜咽流涕，何其之动人！教育于此夫复何言哉！

近来无锡国专研究论著中一串豪华的教师名录和杰出的学生名单，都是一种传奇。此不赘述。

余论

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所有的传奇都会被关

注，无锡国专在当代大学研究的视域中越来越被关注，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32]和谢泳《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33]对其评价最受瞩目而多被援引。其实，早在1931年，无锡国专办学十年时，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便来考察演讲，唐克尔和培根伦两人一致盛赞：“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28]¹¹³³⁻¹³⁷该团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认为：“中国乃一有悠久传统文化之国家，凡将一国固有之历史上之文化全部牺牲者，其结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凡一国求生存于世界，固以研究科学为先。然研究科学，必当先使国民自觉。而国民自觉之心之发动，惟有借国学以发扬光大之，而后可以保持各国固有之民族精神，此尤须研究本国历史和固有文化。”^[28]¹¹³⁷

1935年，著名学者、图书馆学家、古典文学家、史学家柳诒徵在《江苏教育》第四卷第一、二期撰文《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称：“今之专以中国学术文章教授来学者，只有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及上海正风文学院。”“在今日一切学校师长中，深知中国文化之重要，且息息以救国救民为念者，殆无过于唐氏。”^[28]¹¹⁸⁸

可见，唐文治办学长校的南洋大学和无锡国专在当时的大学办学水准上真正做到了与“国际接轨”。这两个性质迥异的大学兴办成功的个案在今天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呢？

尤其唐先生一人独任校长三十余年的无锡国专，几乎就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在当代，似乎不可能由一个人做校长领导一个学校如此之长时间，而唐先生的领导从虽已目疾却仍查看中小学生宿舍替孩子盖好夜晚滑落的棉被，直至与教育部长交涉公私往来函件，莫不亲力亲为！他有严格到要去找人带话警告严斥上课轻浮的教

详见吴淦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及刘桂秋的《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等。

参见《饶宗颐学述：动荡岁月》，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2页。

详见吴淦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及刘桂秋的《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等。

唐先生批阅学生文章极其细心，听秘书陆景周读文章，随时加批，篇末总评。往往一听文章不需说作者，唐先生就知道是谁的文章了。后来学生回忆文章多有提及。

师，也有宽容到学生醉酒大声喧哗学校时说“我年轻时也喝酒的”。他有苛刻到明知儿子被冤枉也要开除，也有在不违背原则时为盛宣怀通融推荐亲友孩子入学的“开后门”。^[34]但是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行政管理，唐先生让所有师生为之钦服的是其人格的魅力和感召力。绝大多数的学者之所以来无锡国专任教不是因为丰厚的薪酬，而在困难时期，谁也不离开无锡国专去他校兼课的原因更是不在于工资待遇，而在于唐先生老校长的人格魅力！试问，今天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有多少校长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招聘到一流名师学者的？确实，“没有挖不来的人，只有出不起的价”，这句话在商界也许没有问题，但在教育界，是一种功利还是进步？教授移砚别处设帐谋生本无可厚非，有人事、家庭诸多原因，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教育是要一个精神相似的群体言传身教、一起努力的。教授们的流动是在寻找精神相似的教育同仁，而不是一次次“转会”的身价倍增，那样的话，教授与演员、球员何异？（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演员、球员的意思，只是说，我们不同的职业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而校长们能在不谈钱的时候聘来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教育这件有意义有情怀的事，这才是教育应该有的生态！

1950年，老校长唐先生八十六岁，无锡国专并入江南文化教育学院。他成了名誉教授，薪水未减，但他才算真正离开了身体力行的教育，而他的人生也随之步入垂暮尽头。校长可以做到老死，犹如战士守死边疆，这是何等的令人艳羡！在今天，不要说校长像市长、县长一样的遵守年龄资历的要求，按时定点的上岗卸任，就连教授也必须到了年龄就离开讲台。我想，我们是否没有把学校当作一个不同于政府管理的独特的机构，同时也忽视了学校中各个学科之间人才的培养成长成熟贡献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各有时段的，例如体育课的教授五十岁驰骋课堂就很困难了，而中文教授五十岁才能够说得上是成熟了。不分学科特点的年龄一刀切，看上去很公平，但是会造成人才的大大浪费和成才路径的扭曲。我们只要把无锡国专的教授们的年龄排列一下，甚至我们把在没有用年龄为限的时候的大学教授们的阵容排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今天以年龄来决定教授的去留升降是一种工厂管理的条规移到教育中来的体现。干车工钳工与讲课育人是不一

样的，年龄在前者和后者的标准是不同的，而今天我们一样了。

大学用工厂的标准管理，我们似乎应该反思了。当年无锡国专既有严重超龄犹如“老黄忠”的陈衍，也有一骑特出的青年才俊钱师，构成了一个合理的人文生态。在今天，我们把科研当成了体力活，文章写得快出得多当然要年轻力壮。理科要做实验也许可以，但对文科无异于在已经极为浮躁的学术氛围中不断施压升温使其颠狂。除非天才如陈寅恪、钱钟书，文科是需要用静静的岁月去成就一个教授，而不是用论文去刺激出一个教授的。无锡国专教授的研究多从课堂中来，多从自己的学术兴趣中来，因此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无锡国专这所学校，更成就了那些在此求学的千百学子。而今天，我们的学术著作是从项目课题中来，项目课题往往是从申报指南中来，大家的研究不是兴趣独立持久而是趋时划一功利，这样的因果相连我想只会出教授不会出学者。

作为一个学者不应时时盯着教授职称和核刊论文，而应该承担起时代和社会民族的文化责任。在大学就是把全部的身心 and 学术心得、读书所悟投入课堂中去，教书育人才是我们的事业！无锡国专唐先生以高价聘任陈衍，不是请他来写文章弄影响，而是请他来给学生讲课和年轻老师讨论学问。^{[28][124-129]} 那年陈衍七十五岁，所开课程有《资治通鉴》、宋诗和要籍题解等。学生受益，教师受益。唐先生宁出十倍于其他教授的高薪聘来陈衍，陈氏到1937年4月回闽之前（同年7月病逝于福州）一直在无锡国专任教，后来的很多学生老师有文章谈及学问受他之影响，这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今天，我们更多地关注高薪聘来的教授给学校拿到多少项目，以学校的名义发了多少论文，极少有校长关心高薪聘来的教授影响了多少学子，在学子中开了多少有影响的课程。可见我们引进教授更多的不是为了学生，那么为了什么呢？一个学校不是把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请问我们办的还是学校吗？我们混淆了大学与高等研究院的功能！学校的“产品”不是论文和科研项目，是莘莘学子！是国家的人才！大学是培养国家人才，不是生产论文。

详见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茹经堂文集》四编，卷八，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的这一传统断裂了。

无锡国专是一所专门学校,在现在,在那里毕业的学生填表格的时候只能填大专,我亲眼看到过钱师表格中的学历:大专。但是无锡国专是一所学校,是一所令在那里走过的所有师生都怀

念的学校,她培养的是那些在文史界卓有盛名的学者和老师。今天很少有人记得当年在无锡国专任教的老师当时发过多少论文,出版过多少专著,但是,从无锡国专走出来的一个个鲜活的人被我们记住了,他们和无锡国专都将被历史记住。

参考文献

- [1] 凌微年. 唐文治[M].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 [2] 唐文治, 唐庆诒. 唐文治年谱[M]. 苏州: 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 1984.
- [3] 唐文治. 先妣胡太夫人事略[M]//王桐荪, 胡邦彦, 冯俊森, 等. 唐文治文选.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4] 陆振岳. 试论唐文治[J]. 苏州大学学报, 1991, (2).
- [5] 余子侠. 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 [6] 杨洁丹. 我市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150周年[N]. 无锡日报, 2015-11-11(A02).
- [7]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 交通大学校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 [8] 吴淦南.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 [9] 秦晖.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N]. 南方周末, 2011-10-13 (D24).
- [10] 陈衍. 石遗室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11] 庄吉发. 京师大学堂[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16.
- [12] 母校历年大事记[J]. 南洋, 1915, (1).
- [13] 欧七斤. 试论唐文治工程教育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J]. 高等理科教育, 2015, (5).
- [14] 邹韬奋. 二十年来的经历[G]//邹韬奋文集: 卷三.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15] 徐忠宪, 胡正访. 辛亥革命前后的教育家唐文治[J]. 江南论坛, 2011, (10).
- [16] 龚鹏程. 读经有什么用: 现代七十二位大家自由谈[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7] 李尧春. 唐文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M]//陈国安, 钱万里, 王国平. 无锡国专史料选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 [18]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文教事业卷二[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 [19] 黄霖, 周兴陆. 视角与方法: 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20] 陈国安, 钱万里, 王国平. 无锡国专史料选辑[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 [21] 邓国光. 唐文治先生《论语大义》义理体统探要[M]//许子滨, 李雄溪. 经学的传承与开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2] 唐文治. 论语大义定本[M]. 无锡: 施氏醒园刊本, 1925.
- [23] 王桐荪, 胡邦彦, 冯俊森. 唐文治文选[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24] 唐文治. 茹经堂文集三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25] 唐文治. 茹经堂文集四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26] 唐文治. 茹经堂文集二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27] 唐文治. 缕析本校之中小学不应停办[G]//刘露茜, 王桐荪. 唐文治教育文选.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5.
- [28] 刘桂秋.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 [29] 黄汉文. 记唐文治先生[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30] 茆萌. 唐文治年谱新编[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3.
- [31] 钱仲联.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南

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32]陈平原.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J]现代中国, 2001, (1).

[33]谢泳. 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N]. 文汇报, 2003-01-27.

[34]吕成冬. 从盛宣怀档案中盛宣怀与唐文治信函往来看盛唐关系[J].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0, (12).

[责任编辑：罗雯瑶]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Tradition of the Past 100 Years: Tang Wenzhi and Wuxi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CHEN Guo-a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 Tang Wenzhi was a famous educator and both a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scholar in modern China. Tang, an educator with a background of Neo-Confucianism, was the principal of both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w called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Wuxi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making them a legend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Since Tang is not only a pioneer of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but also a master in sinology, and 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ew “Practical Learning”. The author of *The Principals of the Four Books* and *The Notes of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he made a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latter is the epitome of his theory. His over 30 years of exploration on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witnessed his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which is still worth studying.

Key words : Tang Wenzhi; Wuxi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for Undergraduates;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